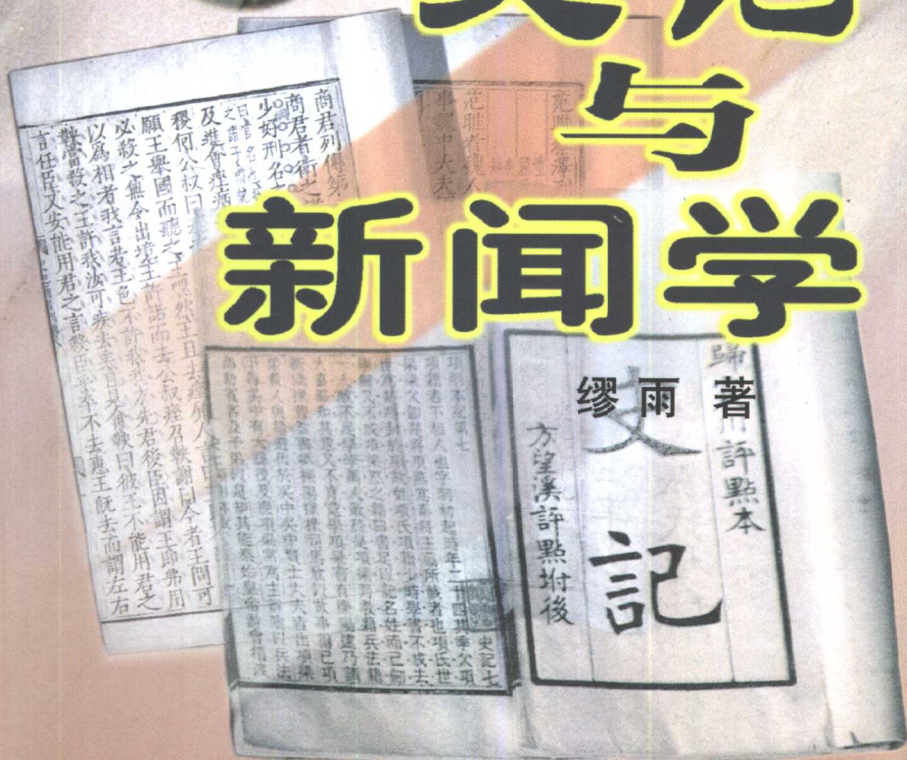




史记 与 新闻学



新华出版社

史记与新闻学

缪雨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与新闻学/缪雨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4

ISBN 7-5011-4834-1

I. 史… II. 缪… III. ①史记-研究②史记-关系-新闻学-研究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9907 号

史记与新闻学

缪雨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京丰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70 千字

2000 年 4 月第一版 2000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834-1/G·1771 定价: 18.00 元



缪雨，新华社高级编辑。1921年生，浙江平阳人。厦门大学肄业。1945年6月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此后一直做新闻工作，先后在新华社苏中三支社、《江潮报》、《江海导报》、华中《新华日报》、淮海战役支前支社、皖北分社和华东总分社当编辑、记者、特派记者，曾任《新合肥报》副总编辑、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总社编辑组长。1982年底离休。著作有《人民日报和通讯员》、《矿山小主人》、《新闻学通论》等。

目 录

第一章 序论

一部伟大的史书	(1)
追寻新闻史迹	(7)
新闻与历史同源	(12)
《史记》里藏有新闻学	(15)

第二章 司马迁——伟大的“记者”

采访游历了大半个中国	(19)
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23)
身遭戮辱 冤沉心底	(31)
发愤著述《太史公书》	(36)

第三章 《史记》的实录精神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42)
好学深思追写黄帝史迹	(45)
历史贵在“无征不信”	(53)
“客观报道”种种	(60)
第一手材料最难得	(68)

第四章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	(72)
“学者多言无鬼神”	(77)
“稽其成败兴坏之纪”	(83)
讲讲历史辩证法	(91)
历史家和新闻记者的“识”	(96)

第五章 独立思考“成一家之言”

叹秦朝“世异变，成功大”	(99)
赞第一次农民起义	(105)
商品经济乃“道之所符”	(108)
“非独刺讥而已也”	(119)
倜傥不羁的心灵	(125)

第六章 心血浇筑民族魂

中华民族始兴于轩辕氏黄帝	(128)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133)
多民族统一 史迹斑斑可考	(137)
“中华一体”思想泽及千秋	(146)
重大的主题：弘扬民族精神	(148)

第七章 太史公“爱奇”

选材的价值尺度	(158)
抓典型和追求典型化	(162)
“奇正相生”之道	(169)
亲见亲闻处最可观	(172)

“爱奇”与新闻敏感	(177)
第八章 历史编纂学的启示	
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画廊	(182)
《史记》是“帝王中心论”吗?	(184)
五体裁书与“十八般武艺”	(191)
“太史公曰”——悠悠历史咏叹调	(196)
整体美和整体效能	(204)
第九章 司马迁文采风流	
风流遍及文史诸领域	(207)
保存下丰厚的文化遗产	(216)
文风改革的一面旗帜	(222)
不愧是语言艺术大师	(225)
记者也要做文采风流人物	(230)
后记	(231)

第一章 序论

常听前辈们谈起，新闻记者也要学一学《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成书在两千多年前，是记述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部五十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它从“荐绅先生难言之”的轩辕氏黄帝写起，一直写到作者自己生活的汉武帝时代，上下跨越约三千年。全书集我国古代文史之大成，“百代之精华备矣”，其分量之重，卷帙之多，内容之丰富，结构之完整，都是空前的。尤其秦汉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有不少是作者采访、调查研究所得，亲见亲闻，写得格外翔实而生动。

一部伟大的史书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两千多年前就产生这样一部伟大的史书，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新中国建立不久，1955年恰逢司马迁诞生两千一百周年，我国古代这位太史公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受到了全世界的纪念。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好几国文字。

《史记》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开创了一种体例，叫做“纪传体”。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的那样，“自此例一开，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

也。”（《二十二史札记》）此后，历代都接续不断地编纂这种纪传体史书，产生了许多代表作，至唐代而被尊为正史。我国的正史，从《史记》开始，接下去有《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至清代而形成“二十四史”，总卷数达三千二百多卷，总字数约四千万字。清代以后，又有《新元史》、《清史稿》。

一部“二十四史”（或者加上《新元史》，称“二十五史”），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连续性。这五千年，自轩辕氏黄帝至夏、商、周，《史记》里有《三代世表》；自春秋战国至秦，《史记》里有《十二诸侯年表》和《六国年表》。从这些表中可以看出，我国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就有编年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自公元前841年至今，凡2800多年的大事，都在正史里逐年记载下来了。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能拥有这样2800多年编年史的呢？没有。所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称“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纵观世界一些文明古国，几经盛衰兴替，它们的文化传统先后中断了，惟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五千年来始终保持绵延不绝。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见证。在这方面，《史记》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人们翻开《史记》，仿佛走进一座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画廊，看到了许多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读到了许多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司马迁运用“纪传体”形式，以生花的妙笔传写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很好地

结合起来，从而又开启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

无论从史学上看，还是从文学上看，《史记》都有伟大的创造，都是一部开创性的伟大著作。

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史诗的时候曾经指出：这些史诗至今“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于我们来说，伟大的《史记》也象古希腊史诗一样，至今仍然显示出“永久的魅力”，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汉文学史纲要》），也正是说出了这同样的意思。

《史记》象奇峰突起，耸立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两千多年来，人们景仰它，学习它，研究它，评论它，一直不断。正如宋代史学家郑樵在他的《通志》中说的，司马迁的《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影响十分深远。

中华民族很早就有记载历史的传统。在司马迁以前，就已经流传下来许多宝贵的历史典籍和文献，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世本》、《战国策》是西汉后期经刘向集合同类简策编校成书而定名的），以及《楚汉春秋》等。它们都是《史记》的重要史料来源。但以前这些史书，或者在所记年限、地域上，或者在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未能构成完整的通史。比如《春秋》这部书，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介绍，是孔子整理周室所藏史记旧闻，兴于鲁编次而成的。它只记载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的史事，而且“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有所刺讥、褒讳、挹损的内容不便书

写出来，只由孔子本人口授给他的学生七十子之徒。以致一部《春秋》十分简略，或有残缺，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后来，“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就是说，左丘明依据《春秋》所记，把有关的历史事实具体地叙述出来，写成了《左氏春秋》，即后来所称的《左传》。比起《春秋》来，《左传》自然要充实多了，它叙事形象生动，传人肖物富有文采，但所记主要内容仍局限于列国纷争和兼并，时间仍局限于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至于《国语》、《战国策》，则属于国别史汇编性质。它们都未能全面地反映和概括整个历史进程和面貌。只是到了司马迁作《史记》，这才“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我国才有了第一部完整的通史。

《史记》这部通史，称得上“涵盖古今，包罗万象”。时间，贯通上下古今三千年；内容，不但包括政治、军事，还包括国计民生、学术文化、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等，举凡治乱兴衰，典章制度，人物思想，风土人情，社会百态，几乎都被它囊括进来，收入笔底。司马迁把他的如椽之笔伸向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各个领域，甚至触及历史人物的心灵深处。

后人称赞司马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他写的这部通史，气魄很大。从“思接千载”来说，他追根溯源，把古史源头一直上溯到原始氏族社会，从轩辕氏黄帝写起（见《史记·五帝本纪》）；从“视通万里”来说，他的笔触，最远已经触及古罗马时代的地中海（见《史记·大宛列传》）。

这里，不妨先来读一读《史记·大宛列传》。这篇列传里讲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张骞奉汉武帝之命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本为联合月氏，对付匈奴，任务虽未完成，却因此访问了大宛、大月氏、康居、大夏等地（都在中亚细亚），成为

正式穿行古“丝绸之路”关键一段的第一人；第二次出使西域，又派出许多副使，进一步扩大了中西交流。嗣后汉武帝“益发使抵安息（即波斯）、奄蔡（在咸海、里海间）、黎轩（即古罗马时代地中海南岸的亚历山大城）、条支（在波斯湾西北岸两河会合处）、身毒（即印度）国”。列传介绍了上述这些外国的不少情况。比如，它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是汉朝的使者和散亡士卒将铸铁技术传给了当地人；又记载穿井技术传到大宛的情况：“闻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等等。这些历史事实，记载于两千多年前，虽然简略，却十分难得。当时，世界上各个大的地理区域基本上处于隔离状态，互相不了解，还不可能有统一的世界史；而《史记》这部书，却不但知道中亚细亚一些国家，而且知道在更远的地方还有波斯、罗马、印度等国，它简直成了两千多年前汉代中国人已知的世界史了。仅此一端，可以想见司马迁视界之宽，思虑之远，以及他所处那个时代的雄风和豪气。

司马迁的写作抱负，比一般历史家作史要广大得多。《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其主旨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司马迁展开了“集大成”的工作。他以广阔的胸怀拥抱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他把“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等古代各种文史资料都尽可能地融会进来，把一生采访所得“天下放失旧闻”都尽可能地网罗进来，将《史记》写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代中国通史，从而也就为后人珍藏下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正因为它是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古代中国通史，今天的人们读《史记》，就不但可以知道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情况，从中获得丰富的历史知识，领略到中华民族优秀的文

化传统；而且可以从中追寻各行各业先人们活动的一些历史轨迹，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学科的历史渊源。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有关方面的学科不消说了，就是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也一样。

比如医学，我国著名中医眼科专家唐由之就有体会。他说：“拿眼科来说，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就记载，扁鹊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可见我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眼科大夫，挖掘开发中医眼科十分重要。”唐由之设计的“中医治疗白内障针拨套出术”，就是他从古代医书中得到启发，经过多年实验研究而设计成功的。这种针拨套出术，扩大了白内障的治疗范围，已使数以千计的盲人重见光明，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又比如水利方面，新疆吐鲁番盆地和哈密盆地的坎儿井，也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一项创造。这种坎儿井，是从山地水源那里开始挖一条地下暗渠，长度不一，最长可达二三十里，每隔二三十米凿一个通地面的竖井，各竖井的深度沿山坡往下逐渐减小。暗渠的水流近农田的时候，才挖明渠，让水流出地面灌溉农田。据传，这种坎儿井是当年汉军屯田时首先使用，后来在当地逐渐推广的。现在，这样的坎儿井在新疆总长已达三千多公里，成为我国最长的地下灌溉系统。这一著名的水利工程技术，在《史记》里也可以找到它的渊源。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在陕西蒲城一带穿渠，引洛河水灌溉农田。“于是为发卒万余人穿渠”。修渠的时候，因为地面土质疏松，“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西汉的时候，京师长安的畿辅范围相当大，有京兆、左冯翊、右扶风，称作“三辅”。陕西蒲城一带当时属左冯翊，司马迁的故乡韩城一带也属左冯

翊。在司马迁家乡穿凿的这种井渠，不就是后来的坎儿井吗？

追寻新闻史迹

我们学新闻专业的，当新闻记者的，是不是也可以从《史记》里找到一些古代新闻活动的历史轨迹呢？看来也是可以的。

当然，新闻之形成为专业，那是近代的事情。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产业革命之后，才出现专门从事办报等新闻活动的职业队伍——新闻记者，新闻这个专业才在新的社会分工中产生出来。《史记》只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当时还没有新闻之一说。但新闻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就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新闻学，需要对新闻这种社会现象进行历史考察。事实上，我们在《史记》里也确实找到了古代一些比较原始的新闻传播现象，看到了近代新闻产生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些新闻史迹。

比如，《史记·陈涉世家》记载着，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乡下）举行农民起义的时候，夜里，吴广在丛祠中生起篝火，偷偷地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描述了当时动员起义的生动情景。这也可以说类似今天口语广播的一种新闻传播现象吧！这个“篝火狐鸣”的故事，想必早已在民间流传着，或者已经作为史料记载下来，后来才在太史公笔下出现的。如果这个故事在发生的当时，就有条件像今天一样及时而广泛地传播，那它岂不也是一条很重要很精彩的新闻吗？

又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着，汉高祖刘邦从起兵到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好几次新闻传播现象。

先说刘邦起兵。当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号为张楚，声势浩大，各郡县子弟纷纷杀县令响应起义。刘邦故乡沛县的县令心里害怕，也想不如趁早响应农民起义。当时在沛县衙门任职的萧何、曹参劝县令说：“您是秦朝的官吏，现在想背叛秦朝，响应起义，只怕沛县子弟不听您的，不如召集流亡在外的人回来，借他们的力量挟制沛县子弟，大家就不敢不听。”这样，县令便派樊哙去召流亡在外的刘邦。刘邦带着数十百人回来了。县令一看，后悔起来，生怕有变，竟关闭城门不让刘邦进城，还打算杀掉作此建议的萧何、曹参。萧、曹二人只得偷偷越城而出，投靠了刘邦。刘邦乃“书帛射城上”，告诉沛县父老说：“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令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意思是说，天下受秦之苦受够了。现在父老们即使替县令守城也守不住，起义军各路诸侯并起，马上就要杀进县城。沛县现在起来一同杀掉县令，选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响应起义，则家室可以完好；不然，父子都遭屠杀，无谓了。城里父老接到这封帛书后，果然率领子弟一同杀掉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于是，刘邦被拥立为沛公，收沛子弟两三千人，正式起兵反秦。

这“书帛射城上”的帛书，拿今天的新闻术语来说，也是一篇相当漂亮的“公告性新闻”。刘邦写在绢帛上的这封公开信，五十多字，相当口语化、通俗化，简单明瞭，晓以利害，很能打动守城父老的心，效果不错。当时还没有象今天这样的传播技术，只好用弓箭把它射到城头上去。弓箭就是一种原始的传播手段。

后来刘邦最先进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又西入咸阳，封秦重宝财物府库。然后还军霸上，召集关中父老豪杰

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刘邦又派人跟同秦吏一起，下到各县、乡、邑去传达这个精神。秦人听了大喜，争着拿牛羊酒食来劳军。刘邦推让不受，说仓库里粮食多着呢，东西不缺，不烦费大家了。秦人更喜，唯恐刘邦不王关中。

这“约法三章”也是一篇好新闻，不过一百多字，政策性很强，又通俗。传播的办法不是靠帛书写公开信，而是靠召集父老开会传达。刘邦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针对秦朝苛法，宣布约法三章，简单明瞭，又派人下去深入传达，很得人心。

最后该是有名的垓下决战了。这一次是淮阴侯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大败项羽于垓下。项羽兵少食尽，汉军围之数重。夜里，忽闻四面皆楚歌，项羽大惊，以为汉尽得楚地，乃连夜与麾下的八百骑兵壮士溃围而走，“是以兵大败”。最后被追杀到乌江附近，自刎而死。

这“四面楚歌”乃是汉军发起的一种政治攻势；从新闻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种新闻传播现象。关于“楚歌”，后人有不同的理解，一说是口唱的，一说是箫吹的。不管唱也好，吹也好，反正是用楚声楚调来传递一种信息。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当时项羽对这个信息的反应是：“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因此，他的斗志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史记》里还有一些历史故事说明，新闻这种社会现象也有它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也是万万违反不得的。古代那些昏庸之主，亡国之君，在对待新闻和舆论问题上所犯的一桩

桩错误，留给后人的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幽厉是西周末年两个有名的昏君。先说周厉王。他当国王，行为暴虐、奢侈、倨傲，国人常在背地里批评他，多有怨言。大臣召公听到后，提醒厉王说：“民不堪命矣！”就是说，老百姓忍受不下去了。厉王听了，不但不警醒，反而很生气。他起用卫国巫师去监视那些口发怨言批评国王的人，只要巫师一报告，就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杀了。这样，批评国王的声音是少了，但国王的威信随之降低，各地诸侯也不怎么来朝见了。后来，周厉王的统治越发严酷，弄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只用眼色示意。厉王反而很得意，告诉召公说：“你看，我能平息舆论了，没有人敢说我的坏话了。”召公说：“这哪里是什么平息舆论，这是堵塞言路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奔流的河水被堵住以后，会冲决堤防，伤人必多；老百姓的嘴巴被堵住以后，也会一样的。所以治水应该疏导宣泄，治民应该让老百姓说话。”召公还说了好一番道理，厉王却一点也听不进去。这就是“厉王弭谤”的故事。过了三年以后，那些一直不敢说话的国人便相与联合起来暴动，袭击厉王。厉王出奔，逃到了彘（在今山西霍县一带），最后也就死在那里。

无独有偶，周厉王的孙子周幽王也昏庸得可以。“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原来，这个周幽王宠爱美人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就是说，想各种办法让褒姒笑，她总是不笑。后来，这个昏王想出了或者采纳了“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当时，西周最紧急的外患是戎狄入侵。烽火本来是用来报警的。幽王为博取美人一笑，竟然让烽火台燃起烽火，擂起大鼓。各路诸侯接到烽火报警，以为戎狄入侵，纷纷派兵来救。可是到来一看，却不见什么戎狄的